

有疑問。甘迺迪在第一次國情咨文中，即曾特別提出將波蘭在美凍結的存款予以解凍，以作和平的用途，這種對鐵幕國家所提出的新試探，或許也是受羅斯道的影響而來。

六、羅斯道原為經濟學家，其立論顯係以經濟為其主要出發點。可是他和其他民主黨人士，乃至大多數美國政論家一樣，似乎有一共同缺點，即他們一致假定共產世界與非共產世界之間確有和平共存的可能性；其次，他們又一致假定中共匪幫在中國大陸上業已建立了鞏固的政權。由於上述兩項假定作前提，所以他們推論的結

果，便必不可靠。

七、羅斯道也和鮑爾斯等一樣，特別着重於印度對自由世界的關係，好像印度的前途便是整個自由世界前途的關鍵。印度的重要性原是不可忽視的，但美國政治家似乎有過於重視印度之嫌，這不僅在認識上有其缺陷，而且有鼓勵中立主義抬頭的危險。甘迺迪邇來的作法似乎就有不諱言鼓勵中立主義的意味，例如對寮國問題、非洲的剛果問題，皆顯然可見。這一點也似乎與民主黨爭取落後地區的基本目標相違悞，往往令人感到惶惑。

印度式中立主義與美國冷戰策略

三月三十一日

壹

美國民主黨政府，執政兩個半月以後，在外交上已有一種明顯的趨勢，即積極爭取在亞非地區中一向標榜所謂中立主義的國家，作為她試圖從蘇俄手中奪回冷戰主動的策略之一。理論上這并不是一種新的戰術，早在一九五六年六月，艾森豪總統即曾提出過對中立主義者新看法的政策性聲明。那時他認為：「如果確係中立國家，則一旦遭受外來侵略時，人將予以同情；反之倘一國與強國締結有軍事協定，則一旦於其邊境發生爭端時，且極可能發生爭端，人將指其係咎由自取」。而「美國在立國初期的一百五十年中，對於

美國以外的國際戰爭及歐洲問題，也一直是保持中立態度的」。艾森豪當時是爲了加強在國內競選的政治號召，並爲了對抗蘇聯的經濟與外交攻勢，故提出上述「中立化中立國家」的理論，但立即受到東約國家組織國家的質疑，因此杜勒斯故國務卿乃立即加以補充的解釋。杜卿基本上是不苟同所謂中立主義的，他認為：「惟有構成集體安全制度的軍事聯盟，始能保證自由世界免遭共黨統治」。而所謂「中立主義，乃是假定一個國家獲得其本身安全的最佳途徑，在於漠視其他國家的命運」。又說：「這是一種愈來愈陳腐的觀念，除在極例外的情形如瑞士外，亦爲不合道義與短視的觀念」。由於杜勒斯的擇善固執，所以在艾森豪二任當選以後的期間裏，對

於標榜所謂中立的國家，美國并未有進一步的合作關係，直至一九五八年西藏發生了抗暴革命，匪印間發生了嚴重的邊境糾紛以後，艾森豪才有訪問印度之行，一時曾被認為這是美國冷戰中的一大收穫。

如今事隔五年後，這一個曾被杜勒斯認為愈來愈陳腐且不道德的短視觀念，却被民主黨政府用作新的冷戰策略之一，公開而露骨地表示出美國對中立主義者的嘉許。

貳

由於美蘇雙方在核子僵持與繼續軍備競賽的冷戰當中，印度在印度洋擁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特別是在民主黨的一部份外交策士們，還認為匪偽政權將不會在短期內消逝而又係以美國為敵的時候，印度所處與共匪相隣的戰略地位以及她所擁有的三億九千萬人口與戰略物質，尤其是尼赫魯所標榜的民主建設與中立主義已在亞非國家中產生了相當影響的力量，決不能讓她一面倒向俄帝，因此印度乃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十年前尼赫魯標榜中立，主要還祇限於討好匪俄的一種畏戰苟安心理，故儘量避免與冷戰雙方發生硬性的同盟關係；如今却已由於亞非國家在聯合國中席次的增多，再加上得到美國的鼓勵，尼赫魯顯然又想鼓其餘勇，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政治活動。甘迺迪總統在其就任後的第一次國情咨文中，曾破例的對兩個外國的政治領袖大加讚揚。一個是尼赫魯，同樣受到重視的另一位外國領袖，便是邱吉爾，但後者已經是退休不問國政了。緊接着又發表前任美國駐印大使鮑爾斯以及一向以支持亞非中立路線相標榜的史蒂文生出任外交要職，已顯示了美國新政府外交路線的重點之一。最近聯合國安理會在辯論葡萄牙屬地安哥拉糾紛一案時，史蒂文生事先未經與北約國的美國盟邦協調，也不理睬葡萄牙，就以反殖民主義的姿態，站在亞非集團的一邊，「仗義執

言」，使英法也大為驚奇，接着美國又贊同譴責南非聯邦之企圖合併西南非洲。目前寮局惡化，永珍岌岌可危，美國一面申言決心不讓寮國為共黨所吞併，一面甘迺迪總統却又特派巡迴大使哈里曼前往新德里向尼赫魯移樽就教，并親電尼赫魯請其促蘇聯接受英國所提和平解決寮局的建議。三月二十九日東約理事會閉幕後，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復前往新德里與尼赫魯進行會商。這些外交的動作，自然都可以解釋為是美國冷戰策略之一種運用。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九五四年尼赫魯的妹妹潘迪迭夫人担任聯大主席時，印度的中立主義當時也得到美國民主黨政府的鼓勵，再加上艾森豪總統也急於要結束韓戰，所以便帶來了韓戰的停火，北韓共黨政權也取得了「合法地位」。以後到了一九五五年，尼赫魯又主催亞非萬隆會議，大唱共和平共存與中立之濫調，結果是帶來了美匪華沙談判的開始，英國於隨後不久也就派遣代辦駐北平。每一次當中立主義氣餒高漲時，反共陣營必有一次的挫折，共黨佔到了極大的便宜，而其最後的影響，還是美國聲威的逐步下墜。

參

從西方的觀點來解釋，冷戰是既非戰爭，又非和平，而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權力鬥爭，它包括使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和心理的，乃至軍事性的各種手段，來全力進行。但是冷戰而想要獲得明確而肯定的勝負，他們認為勢必無法不挑起一個全面的核子戰爭。美國人民深知這樣的核子大戰將是一次難以令人置信的浩劫，但同時美國又被迫必須考慮到如何保護和推進其長期性的利益，因此在繼續從事軍備競賽并繼續維持其大同盟政策以對抗共黨侵略集團的同時，便不能不注意到如何爭取「中立」的國家。這些所謂「中立」的國家，多數是在道德上冷感，直覺上反西方殖民主義，而又存着投

機僥倖的心理，認為遠離而逃避戰爭，戰爭就可以避免，因此拒絕加入任何集體安全的措施。美國則認為當俄匪集團以中立主義為幌子相號召時，美國決無法以嚇阻的理論或使用金錢購買來贏得「中立」國家的合作，因此最好是能迎合他們的心理，透過溫和的接觸與不帶條件的經濟協助，從事長期的爭取。甘迺迪總統周圍的經濟與外交顧問們，多數主張美國結合其他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對開發落後的地區進行長期性的計劃援助，這已經成了既定的政策，它是假定長期的「冷戰」，時間的因素對美國也是有利的，日本當局也顯明的存有此種看法。

可是我們看看俄帝侵略集團却始終也決不會放棄以暴力作為威脅和敲詐的手段。他們認定冷戰的本身就是一種戰爭。它的戰術是有時前進，有時後退，但無論是前進或者後退，并不依照一般的邏輯、真理和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而只是為了適應權力情況的戰術要求。它永遠是追求一個不變的赤化世界的目標，另一方面當客觀形勢指明出來應該改變其戰術時，它就會作突然的改變。當政治性或經濟性的滲透機會頗有希望時，它會保留其權力作暗示性的威脅；一旦當暴力的進攻顯得更收獲時，則它便毫不顧忌地使用軍事手段，包括從游擊戰以至於對有限地區所作的直接或間接的軍事支援。但是作為其背景者，始終是共黨的軍事威脅。目前的察戰是如此；共匪對印度的軍事威脅也是如此。

甘迺迪總統準備長期從事冷戰的決策，多少似仍受「和平共存」觀念的影響。此種決策的利弊得失，印度尼赫魯十年來所標榜的偏見中立政策所帶來的後果，已提供了事實的借鏡，倘使祇作為一種配合的手段來運用，而不是作為打擊俄帝集團的全盤戰略骨幹，那也許不妨嘗試。可是縱然是嘗試，却也不能不顧到美國與其他反共盟邦的合作與維繫。因為中立主義基本上它是不辨敵我，不分

善惡是非，不分自由與奴役，純粹祇是自私與短視的實利觀點上着想的。倘使美國強調中立之可貴，有如甘迺迪總統公開表示希望着察國能成爲一個「中立的國家」，魯斯克又認為奧國式的中立，最合理想。總之都是贊同中立作風的。試問東約組織中的亞洲反共盟邦，又何必再接受盟約的約束而不「中立」呢？中立就是看不見「敵人」，而敵人也正好得到了最佳的掩護，在民主國家中潛伏滋長。當然，甘迺迪總統的所謂爭取「中立」國家政策，也有它積極的一面，例如他希望中立化波蘭，他希望拉了美洲在美國的強力的支持下，對共黨集團守「中立」，他號召籌組世界和平團前往開發落後的地區，從實際的類似宗教團體的服務工作中，爭取落後地區的人心。他強調不僅爲了抵制共黨而奮鬥，而且要爲了拯救人類的貧困與飢餓而奮鬥，他更強調不能爲了抵制共黨的侵略而首先在自由地區的國度裏削弱了民主與自由。這些都是合於人性的理想，但却是遙遠的理想，連甘迺迪總統自己也認爲這種理想，可能在他任內，乃至一百年以內，也不會完全實現。但眼前的問題是面對一個狡酷的強敵，如何能使美國在向着這些理想的目標前進時，不受到幾乎是必然會遭遇的打擊。尼赫魯在十年前首創印度式的中立主義時，也有他的理論和理想，今天却證明是行不通的謬論和幻想。

肆

我們先看尼赫魯的理想：十年前他希望着：讓印度能超然於「東西兩大集團」的權力鬥爭之外，來積極從事印度本身的經濟社會建設。他忽視了印度本身原是共黨擴張的最好溫床。他以為可以增強民主政治的力量，與印共從事和平的競賽，使人民瞭解印共的暴力政策爲不合國情，從而得以約束印共的擴張。他又幻想着印度可以據有西藏及喜馬拉雅山麓的不丹與錫金及尼泊尔，作爲匪間

的緩衝地帶，同時藉喜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并在外交上與匪俄交好，這樣便能確保印度與共匪間的和平共處。

我們再看尼赫魯的中立理論，一九五五年亞非萬隆會議開幕前，乃是尼赫魯的中立理論最囂張跋扈的時期。在萬隆會議的開幕式中，尼赫魯曾提出了他的精心傑作中立論。他的理論是：一、保持中立以鬆弛國際緊張局勢，乃是達到集體和平與共同安全的唯一公算。不以和平為基礎的安全是不安全的。二、今日亞非地區各國，正致力於經濟的建設，以求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建設的前提在和平，故應全力確保國內及國際的和平。三、參加任何強國集團的武裝防衛，祇足以增加國際緊張局勢，故應皆與之保持和平相處但不加入任何一方。四、亞非地區各國，過去有同一的歷史背景，均曾受西方國家殖民統治，今日却有同一的希望，即望保持新獲的獨立與自由。五、這些國家雖沒有強大的戰力以對抗強國集團，可是她們分佈地區極廣，人口衆多，且擁有重要戰略物資與軍事基地，倘能團結一致，就可以構成一個巨大的影響力量，擺脫強國的操縱，進而影響強國的政策。

尼赫魯的中立理想和理論，未嘗不娓娓動聽，可是十年來現實的考驗，已證明其與他所追求的恰好是背道而馳。印共已擴張成爲印度的第一大反對黨；匪印間已發生了嚴重糾紛，致令印度不得不在三年來連續增加軍費預算，以加速備戰，這已是任何人都已知道的事實，更重要的乃是尼赫魯堅持所謂中立政策的後果，已在印度國內種下了赤化的禍根，而在國際間又大大助長了俄匪的兇獠，阻撓了印度洋地區反共反侵略力量的團結，這種無法估計的損害，已使自由世界和印度同蒙不利。今天印度國內的有識之士已開始對尼赫魯的騎牆政策，公開的予以抨擊，指其爲共黨的尾巴。最近尼赫魯本人在其處理國際事務的若干重大措施上，例如支持聯大祕書

長哈瑪紹及響應派兵剛果等，在過去都認爲是「冷戰」的表演，如今却毫不「中立」的表示了肯定的支持西方國家的立場。美國是否已考慮過尼赫魯中立理論的過時與錯誤，而仍希望其他鐵幕邊緣國家再蹈印度的覆轍呢？美國是否已覺察到印度的反共民意而仍要來支持尼赫魯再回到他的騎牆老窠中去呢？美國的甘迺迪總統應無此意。

伍

在二次大戰以後至最近兩年以前的一段時期裏，俄匪爲了伸張它在印度洋周邊地區的勢力範圍，曾以中立戰術作爲它「和平共存」的主要戰術，「和平共存」不過是一個口號與一種姿態，而其中立戰術才是它具體鬥爭的方式。在這一段時間裏，亞非地區的國家特別是印度，沒有能排除可與國際共黨和平共存的幻想，所以被它的中立戰術所蠱惑。到了今天，連印度人自己也明白，所謂和平共存，原是自欺欺人，自誤誤人之談。如果沒有自由世界反共的力量作掩護，實際上保護了印度的安全，則尼赫魯政權早已被國際共黨裏應外合所顛覆了。站在思想和理論的鬥爭立場上，我們應該繼續對國際間這種落後的中立主義予以有力的駁斥。

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覺察到，現在俄帝共匪的侵略戰術，已逐漸由中立戰術發展爲「解放」戰爭。所謂「解放」戰爭就是民族主義陣線，他們的慾望已經不是中立主義能夠滿足的，倘使今天還想以中立主義來與俄匪打交道，當然爲國際共黨所歡迎。不過，它決難對抗俄匪的多變戰術，也不能配合亞非地區客觀情勢的需要，更是对美國自身倡導的集體聯防組織的諷刺。甘迺迪總統一再表示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將是富有彈性的、現實的。而我們也相信，美國當局一旦發現了它策略上的偏差，也一定會勇於修正的。